

# 面何處去平生

◎周婉窈／文 雷驥／圖

記得是五年前的深冬。父母從南部老家上臺北，一家人在餐廳聚餐，閒聊中話題跳來跳去，不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下，牽扯到白色恐怖，父親提及他的同窗「呂秋鎮」被捕，死於獄中。聽到這個名字，母親急忙補充說他長得很英俊，「睫毛又長又捲，像O.B.耶」，我的姪女，二七年華，聽不太懂臺語，緊張地問道：「阿媽，阿媽，什麼是O.B.耶？」原來是小愛神丘比特的日語發音（キューピッド）！眾人大笑。我母親還意猶未盡，直說「Ro Shujin長得真像俳優」，但「被判刑死了」。

如果我們能把歷史或過去擬人化的話，在燈光璀璨、人聲喧嘩中，我看到歷史的幽靈掂著腳，悄悄地來到我們的餐桌邊，但是，在我們的笑語中，話題不知不覺地滑走了，他遂不得不黯然掩袖離去。

我彷彿看到那依依不捨走出餐廳之門的背影。我很想挽留他。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呂秋鎮的名字，也是第一次知道父親有位「相當知己」（好朋友）的同窗在白色恐怖中喪生。呂秋鎮，竹崎石龜溪人，是父親臺南師範學校的同學，死時大概是民國四十一、二年，二十五歲左右。這是將近半個世紀前的事，父母從來沒提起過，但當他們在兒孫面前第一次提到他時，卻又彷彿如昨日之事，故人容顏如在眼前。呂秋鎮可能因為加入共產黨而被捕；父親說，二二八之後，從竹崎到阿里山鐵道沿線都是共產黨（謝雪紅）的旗幟，他當時覺得很沒出路，共產黨是唯一

的出路，差一點也加入。

呂秋鎮既然是父親的好朋友，那麼說不定有照片吧？我對這個睫毛像丘比特的英俊青年產生好奇，有次返鄉，問母親可有呂秋鎮的相片，竟然有兩張。一張是和父親在臺南師範的合照，穿著白襯衫白西裝褲，果然是翩翩佳公子。另一張是來我家作客，一群人圍坐在榻榻米上的照片，他最靠近照相機，側身回頭，丘比特的眼睛正對著鏡頭。這兩張照片從來就貼在老相簿上，而這相簿我從小就愛翻看，不知摩挲多少遍。但是，如果不是那天父親提到他，就是再翻上幾百遍，也看不到他的存在的。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常驚訝於人之「視而不見」的本事。

我母親的臺語，真正是我的「母語」，她的一些用詞到現在還影響著我。我們幼

小時，她喜歡看電影，是「愛染桂」迷。她對於俊美的男女總愛說「親像俳優」(chin-chiu' p'ai-iu)。我還沒唸書前，沒有文字的觀念，日後才知道「Pai-iu」就是「俳優」，當時只覺得這個詞兒很美，尤其是有個上揚的「iu」音。能被說成「Pai-iu」的人當然是任你想像的美了。那個時代的「俳優」好像跟現在不一樣，母親不會拿這個字眼來說當下的演藝人員，也因此他們無法引發我的憧憬。至於「Q-B耶」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母親在日本統治時期讀了六年的公學校，他們六年間學到的東西常讓我訝異。總之，在母親的用語下，一個俊秀的青年脫胎而出。

我的父親相當寡於言詞，他看我對呂秋鎮有興趣，多少說了一些。他說呂秋鎮小時候很「かわいい」(可愛)，老師非常疼他。事隔多年，每次開同窗會老師都會提到他，一提及掉眼淚，大家也跟著掉眼淚。父親只認識青年呂秋鎮，但曾聽一位呂秋鎮的童年玩伴說，呂秋鎮很頑皮，愛打架。想來是個性格鮮明的人。

他的被「刑死」，在我心中成爲一個抹不去的「字詞」。說是「字詞」，因爲我無法真正想像他「被刑死」的情況，雖然每思及此，總感到一種苦。我年輕時曾經參與大學生的「黨外運動」(在臺大學運之

前，更遠在民進黨出現以前)，除了「因緣際會」之外，這和我對人權的一些基本信念有關。我不是能作哲學思辯的人，但年輕的我時常思考人的極限問題。

我們(但不是所有人)活在白色恐怖中，我常思考或「想像」：在集權統治的鐵輪的壓軋下，人的處境。「刑求」是這種處境的極致。當時不只臺灣在威權統治之下(就是此刻，世界很多地方還是如此，只是我們再也不關心了)，不知是Time或Newsweek會刊登一篇關於刑求的專題報導，我可不怎麼樣的英文程度勉強讀完，受到很大的衝擊。我不記得該專題是否以拉丁美洲爲報導對象；但應未涉及臺灣，因爲當時如果稍稍涉及臺灣，就會局部塗黑，甚至查禁。我常暗自揣想，如果我不幸被刑求，我能撐過嗎？我能不招供嗎？我能在肉體再也無法忍受之下不牽扯另一個無辜的生命嗎？我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脆弱。我無法不想到，如果一個女孩子在每個月最脆弱的時候，受到刑求……。在那樣的年代，這類的「思」時常纏繞著我，令我極度不安。

黃華兩度入獄，前後被關了十餘年。(註一)熱情的陳菊介紹我認識他，初次見面時，他緊緊握住我的手，溫暖而堅定。還記得當時寒流來襲，站在羅斯福路交叉口，我抬頭，望見二月天的冷空，大朵大朵的木

棉花正開著，橘紅色的。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帶著黃華手心的溫暖記憶，我來到美國。當時我們私底下說：「逃離惡魔島」。(註二)在耶魯大學就讀歷史學博士班時，我選擇拉丁美洲歷史作爲副修，不能不說和這類的關懷有關——歷史對我而言，似乎永遠是難以承載的沈重。在耶魯大學，我注意到有個和國際人權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簡稱AI)有關的學生團體，我去了幾次。記得有一次是討論臺灣的案例，他們「認真」了一位臺灣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名字用羅馬拼音，無從猜測中文字。看著一群年輕的美國男女學生，認真地討論如何救援一位關在臺灣——(啊，我那遙遠的故鄉)——某個監獄的政治犯，內心相當激動。這個政治犯的名字就算寫成中文字，在臺灣誰會知道呢？誰又會去關心呢？我相信，這些男女學生當中總會有一兩人，在他們畢業後將繼續關懷世界的人權問題。他們透過層層關卡，幸而寄達某個監獄小角落的東西，就算是一把牙刷，也都將是人間最可貴的禮品。

國際特赦組織的圖徽是「鐵蒺藜中的燭火」——兀自燃燒的白蠟燭，扁在兩圈帶刺的鐵籠中。這個意象，就算未曾帶給在煉獄中徹底崩潰的人一絲希望和溫暖，也



代表幸而活在外頭的人未曾忘記煉獄中人。救援談何容易，且必須小心從事，否則適得其反。我保存著一張緊急救援行動指南。A I 最通常的作法是，動員會員寫信給囚禁救援對象的「當道」。指南叮嚀道：

必須謹記：信要短、要有根據、要有禮貌——不管你個人的感覺如何，〔語氣〕不能是憤怒的或指責性的。你想必不願被當成找碴的人而不被理會。國際人權特赦組織絕對是非黨派的。它從來不支持或攻擊任何政治體制，以保護其客觀中立的聲譽及其會員。切勿在信中採取某個政治立場。必須假定政府官員不是不知情，就是不願意管事。切勿直接作指控；切勿用「刑求」這個字眼。指出政府對其公民的責任。如果有任何正面的發展，給予稱讚。切記：在許多案例裡，緊急救援信之所以發送是因為有刑求和處決的可能性，〔其目的正是〕要盡一切的努力以阻止這樣的事情。（楷體係原文劃底線的字）

明明知道「刑求」在所難免，卻不能提，這不只是出於禮貌，更重要的是，這是必備的「常識」——外頭越是積極救援，裡頭的人往往遭受更多的折磨。

在耶魯的最後幾年，我習慣在星期天閱讀厚厚一大疊的《紐約時報》。我在附送的《紐約時報雜誌》讀到一篇有關拉丁美洲人權迫害的專題報導。該文以宏都拉斯一位年輕女子的遭遇為焦點，她是二十四歲的殷轟絲·穆利悠（Ines Murillo），左派異議分子。一九八三年三月她被宏都拉斯軍方惡名昭彰的秘密情治單位「316大隊」（Batallion 316）綁架後，囚禁在某個地下室，遭受非常殘酷的刑求——全裸受刑是其原則；其方式恕我不願重述。她撐過八十天的酷刑，最後竟得活著出來。穆利悠出獄後流亡墨西哥。（註三）照片中沒有笑容的穆利悠，眼神沈凝，給我很深的印象。很巧的是，不久我的先生到加拿大任教，我們搬到溫哥華，有一天竟然看到A 4 大的黑白海報，一個關心拉丁美洲的團體請她來講演。

會場坐得滿滿的，殷轟絲·穆利悠講西班牙語，有人翻成英文，氣氛凝重。她剪頭短髮，臉龐瘦長，清秀中帶點帥氣。中場休息時，她突然回頭問主持人說：「Cigarette?」原來問可否抽煙。眾人都笑了起來，她也笑了。很燦爛的笑容。

呂秋鎮「Ho-tung heng-si」（被人刑死）。我母親的語句經常盤桓在我的腦海，但我無法，也不願去想像他「如何」被刑死。幾年前的一個初夏日，我陪朱德蘭教授

訪問陳延芬女士。陳女士是我的臺大學長王克文教授的母親，我稱她王伯母。當時朱德蘭因執行一項有關白色恐怖的研究計畫，想訪問王伯母，我自告奮勇代為聯絡。王伯母氣質相當好，看到她，就會了解何以一雙兒女長得那麼清秀。王伯伯世一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調查局人員帶走，從此開始半年任人蹂躪、凌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日子。

王世一被捕的罪名是共產黨。他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機械系，一九四五年在重慶考入戰時運輸管理局訓練所的高級機務班——後來整個運訓所的人被羅織成一個牽連二、三十人的鐵路局與公路局「兩路大匪諜案」。王伯伯在一九四六年來臺，服務於鐵路局。他做事一板一眼，耿直單純，是技術專家型性格。他因老家遭受共產黨清算，痛恨共產黨；當了公務員後，加入國民黨，還曾被褒揚為優秀黨員。

他被帶到調查局後，還弄不清怎麼一回事，調查局人員就命令他跪著爬進門，因為匪諜不是人，不配走著進門。他們刑求他，要他招供、牽連別人。在製造自白書的過程，他的十個指甲被香煙燒掉，由於辦案人員不滿意他的自白，兩三個月後，又燒了一遍。他遭受各種酷刑，腸胃受到致命的摧殘。但他們最後讓他養傷。半年後，開第一

次偵查庭，家人第一次見到他，刑求受傷的部份大都已癒合，但腰部、腿部仍有瘀血和傷痕。他當庭申請驗傷——王伯伯是個天真的人，王伯母噙著淚，啜嘆著，他以為法庭可以還他公道。法庭裁判他確實受傷，但無法確定何時受傷，因此不足以證明有刑求的事實。

王伯伯在調查局，遭受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想得出來的虐待和凌辱。王伯母條列八項，文字簡單平實，毫無點綴性的字眼，也就在這種平實的敘述中，一種超乎文字的恐怖脫身而出。稍有想像力的人，不能不感到心被挖了一個洞。王伯母眼淚直下，我們各自悄悄拭淚。我常常想，王伯母、克文兄妹如何忍受這種「知」呢？王伯伯已經過世多年，但這種「知」將永遠伴隨他們，永遠折磨他們。

關於喪心病狂的虐待和凌辱，或許我應該舉出一二項，讓讀者有「親歷其境」之感，以增加文章的可讀性。但是，我無法這麼做。事隔多年，王伯伯每一提及，無不聲淚俱下。我無法把它當「談資」來寫。我們的媒體，習慣以最聳動、最裸露的方式報導他人的不幸，任何悲劇不過是誇張的漫畫。

王伯伯還在調查局時，伯母趁送棉被的機會附了一封信給他，說她怎樣也不相信他是匪諜——讀者諸君，您當以為這是人間多

麼珍貴的信任與安慰！結果王伯伯為此被打了三天，辦案人員說：你太太不相信政府，那麼你就挨打吧。他們要他跪在地上，一面爬一面罵太太。當王伯母和克文在外頭奔波伸冤，辦案人員就更加虐待王伯伯，謾罵、恐嚇無所不用其極。

再多的反證是沒有用的，我們的法庭，根據王伯伯的自白書和他人的口供，認定王世一曾參加共產黨，判他十二年徒刑。王伯伯後來獲得減刑，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獄。身心俱創的王伯伯，出獄後，百病叢生，不到六年就過世了。（註四）

王伯母提到當時的情治頭頭，後來移民到美國，安享晚年，幾年前過世了。她感到很不公平。不過，移民美國、安享晚年，不就是我們這個「凡事沒有後果」的社會的常態嗎？那些刑求王伯伯的人，不也每天晚上照常看他們的電視、讀他們的報紙嗎？退休的法官，日子不是更愜意嗎？是的，我們該怪罪的是那部威權統治的「大機器」；我們充滿溫情的社會，從來假設人是他律的，何從怪罪起？再說，我們喜歡談「用處」，往

事已矣，個人或社會的反思有何用處呢？

■

有個冬天的早晨，我一反平常，起個大

早。過幾天得出公差到日本，或許有點焦慮吧，沒睡好。漱洗後，我坐到書房的牛皮躺椅上。水色帘幕低垂，旁邊的一扇門上頭有個矩形小玻璃窗，在晨曦的照耀下，剔透著一方青冷的藍色光。

對於搭飛機，我有些焦慮。我們的生命像蘆葦一樣脆弱，也像泡沫一樣隨時可能消散；與其說我們面向未來而生，毋寧說是面向死亡而生。搭飛機這件事，往往讓我更貼近地思考「面向死亡而生」的嚴肅課題。讀者諸君，如果您以為我害怕死於飛機失事，那可是大大的誤會。我們無法選擇生的時空，且一般無法選擇死的時空。這是人們命定的。但是，如果上帝賜我恩典，允許我有所選擇，我寧願在空中灰飛煙滅（我不是詛咒某班飛機，而是說如果非得有架飛機失事的話）。這不是沒有緣故。幾年前，我的婆婆過世，我們在第二殯儀館火葬場送她最後一程。周遭的吵雜與髒亂是超乎想像的，工人像拖拉貨櫃一樣處理棺木，讓生者極端不忍，極端難過。事後我們接到一紙火葬證明書，開具者還是我的朋友陳菊女士（當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看著這個名字，只有苦笑的份。

玻璃的藍色晨曦，是清冷的。我想起巴秋鎮。他被刑死時才二十五歲左右，我尚未出生。如果他活著，我當稱他為世伯。這位





未曾謀面的世伯給我一種親切的感覺，或許，我多少把他想成年輕的父親。我不敢想像他在牢獄中的際遇，不過，我很想知道浮現在他腦海中的最後的念頭。他如何想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子呢？他如何想他的朋友和同志呢？在他最難撐的時刻，會不會有過這樣的一絲念頭：「這世界終將有人知道我受的苦，我的犧牲，我的信念」呢？我想起我在荏弱的母親，如果她也必得帶著我的大哥在這個冷酷的世間，獨力活下去，她可以嗎？我的淚水不管用地傾瀉下來。

藍色的晨曦是冰冷的。但是，此刻，我多麼希望呂秋鎮還活著，我多麼希望拉住他的手，讓他觸摸這冰冷的晨曦。再冰冷的東西，也只有生命才能感知。我很想取消日本之行，我必須寫下他的名字。我的父親不可能寫他，如果我也不能寫他，那麼他將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

我無法忘記那個讓我淚流滿面的冬日晨曦。但是時光荏苒，我做事缺乏效率，而且總要求自己只能在真正有空檔時才寫散文（雖然寫散文在我不比做研究不嚴肅），我於是懷著一次比一次更高的焦慮，搭飛機、出差。

臺北東區最時新的信義計畫區，街道寬敞，您或許會有逛進某個美國高級購物中心的感覺。日本東京的幾家三越百貨公司，尤其是日本橋的本店，格調頗高；這裡的新光三越多少給人這種感覺。不過，當三角廣場搭棚子以超高音賣時髦膏藥時，您當能深切感受到臺灣「馴化他者」的能耐。眼前的廣場鋪著大塊方磚，迎面走來一對夫婦，牽著一個小女孩，臺灣典型有錢小家庭的模樣。小女孩要上廁所，太太叫她蹲到石磚上，當場解決。先生在旁耐心等著。新光三越多的廁所，一樓地下室離小妹妹方便的地方，也不過數步之遙。天下哪有這麼懶惰的父母！

有幾個學期，我在清華大學上課，一早從臺北出門，足足上一個下午的課，等走出校門搭上客運巴士時，疲憊的身心最期待的是放鬆和休息。此時，夜幕低垂，華燈初上，在一些我住過的地方，家家的燈火總給人溫馨的感覺，然而，從巴士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在刺目的強光中，卻是一攤又一攤，似乎永無窮盡地輕薄展示肉體的檳榔西施。我有個教授同仁引此為豪，因為只要「別人沒有、臺灣有」，他都與有榮焉。作為女性、教師、臺灣史學者，我無法感到光榮，只有沮喪，以及加倍的疲憊。

一個新春的日子，家二哥載著我父親和

家人從外頭返家。我家在舊縱貫公路的巷術裡，入口的巷道原本不算窄，但在家家戶戶有車之後，變窄了，無法錯車。這巷子左側是鎮圖書館，門前闢為停車場。不過，您若來借書，可別冀望有停車位，由於國人善於化公為私，它已成爲鄰近住戶的泊車地，也是路口一家排骨飯攤的停車場。我們轉入小巷，開到一半，停車場有輛轎車開了出來，這個時候，按照「路權」觀念——或只是出於禮貌——應該讓我們先過去，但是前面的車頭硬是直挺過來。我們背後是縱貫公路，無路可退。家二哥只好小心翼翼地盡量往右邊開，突然一陣金石摩擦聲，後視鏡刮到了水泥圍牆。我分了心，還搞不清楚時，一個緊急剎車，兩輛車似乎同時停了下來。對面轎車跑出一個粗壯的男子，窮凶惡極，一副要把家二哥扭出來打的氣勢。

他的確是要打人。他說我們故意撞他的車——賓士轎車！他咬定我二哥撞了他的車後，還想逃。原來是，當後視鏡刮到圍牆時，家二哥大概也分了心，不曉得已經「碰到他的車」，還繼續開了幾秒鐘。這個人三十出頭，大概剛吃完排骨飯吧，他的太太（或情人）也出來嚷嚷。我父親說，我們就住在前頭，哪裡是要逃跑呢？他要我們賠償。他的車子有輕微的刮痕。幸好上一任鎮長剛好騎摩托車而過，目睹前後一幕，前來



關心；這位橫面的人知道我們是「在地人」，又凶惡了一陣子，才作罷。我想，如果這件事，不要說發生在荒郊野外，就是在「非在地」的馬路，開車的人免不了挨打，或被大敲竹槓，或者兩樣都來。

讀者諸君或許會說，每個社會都有這類的事情（真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此，容我借用林毓生先生的話：程度的不同，若大到很大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不同的類別了。

有時，我的心情沮喪到無法工作。我常常想，如果我不是研究臺灣歷史，也許會好過些。從事研究，廢寢忘食是常有的事，我不抱怨工作的辛苦，但當我走在大街小巷上，面對現世的荒誕怪醜低俗橫暴，我常懷疑：我的努力有意義嗎？如果我看電視，或看新聞，臺灣媒體那無底的沈淪更要讓我拿不起力氣工作了。讀者或許還不甚明白我的意思。讓我換個講法：假如我研究唐代歷史，唐人已矣，我只管按照自己的興趣作去，當代社會如何，可能會干擾我的心情，但不至於干擾我對我的研究對象所抱持的心情。我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並不研究當代臺灣，但是，當代臺灣人是臺灣歷史的載體——直接的載體；他們隨時可以跳上我的紙端，對我嘿嘿笑笑。

如果呂秋鎮還活著，面對今天的臺灣社

會，會有怎樣的感覺呢？我無從揣想。父親曾代我打探呂秋鎮家人的下落，他的夫人和兒子早已搬離石龜溪，據說現在定居紐西蘭。他們和親戚不怎麼聯絡，這是可以想像的。呂秋鎮似乎和臺灣社會失去了干係。

爲了維持一個比較平靜的工作環境和心情，我基本上不看電視、不讀報紙，盡量把當代社會摒在門外；我試著以研究「唐人」的心情來面對我的對象。這原先只是個策略，但久而久之，這個策略逼我思索一些問題。我發現，對以「過去」爲研究對象的歷史工作者而言，這樣的取徑（或態度）具有高於權宜策略的意義——就算稱不上積極的意義，也是研究者的一種自我認定，一種自許的操守。

我稱這種取徑或態度爲：面向過去而生。歷史工作者，和陶坊的陶匠、豆腐店的豆腐師傅、打造飾物的金匠，借用日語的用法，都是「職人」。如果說陶匠面對陶土而生，豆腐師傅面對大豆而生，金匠面對金屬而生，那麼歷史工作者，終日處理過去的資料，也大可說是「面對過去材料而生」。不過，在此要談的，不是取決於材料的性質，而是職人有意識的選擇，是職人對自己的角色和方法採取的自我認定。一個以「過去」爲研究對象的人，也可以把「過去」純粹當作操作的素材，以成就一己的論述；至於爲

了在国际上揚名立萬而操作過去，則是另一種作法了。

面向過去而生的人，最關心的是自己如何進入「過去」。這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我和我的先生到個花園選購盆栽，園丁是位老先生，閒談中提到他在日本統治時期就讀小學的事，在我的提示下，他不知不覺中談了許多。我的先生在一旁嘖嘖稱奇；事後他問說，那位老人怎麼對你知道他們的時代一點也不感到驚訝。我想，在那個時刻裡，他被我的問題提法帶回過去的時空，泉湧般的回憶盤據著當下的心神，不怎麼感知我的存在；況且，我研究的對象大都不具備反觀的能力，不太能跳脫現場。在我的特殊研究課題中，「語言」或「語碼」是敲開過去之門的關鍵。數年來，我淹失在浩瀚無邊的材料裡，閱讀他們的教科書，閱讀他們的報紙，學會了「芝麻、芝麻，請開門」的暗語，但是，午夜夢迴，我也常懷疑自己到底了解了多少。面對暗渺的過去，我不得不俛首自疑。

我心中常懷抱個期望，我期望我的研究能得到研究對象的認可。他們的認可，遠勝於一切。可惜，我的研究對象大都無法「真正」閱讀中文，更不用說學術論文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我不敢奢望他們讀懂我的分析，我只期盼他們同意我對現象的描述。我

的先生曾羨慕地說，他無法起唐人於地下。

不過，我想我們的心情有相似的地方，都重視人文研究的「內在了解」。我研究一個特殊的臺灣世代——戰爭期世代，也就是呂秋鎮的世代。我無法說，我了解整個世代，凡是典型就意含異例的存在；我很希望那些異例人士，看了我的研究，能夠說：啊，他們（相對於他自己）就是這個樣子！懷著這樣的心情治學，雖然距離「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賸水痕」的境界尚遠，畢竟和許多同儕取徑不同，而有千山獨行的感覺。

面向過去而生的研究者並不特別注重研究的當代相關性。我常想，作為職人，我的責任是把過去帶到現在，甚或是未來，至於當代和未來是否在乎這個過去，則非我所關心——如同窮鄉僻壤的陶匠，一心一意只想化陶土為心目中的至形至色，至於它在現世的流轉，只有委之於天。

這個和當代劃清界線的態度，有一天卻受到小小的衝擊。七月的某個星期五，林毓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聽眾頗多，從名教授到年輕學子都有，我有幸躬逢其盛。林先生指出歷史研究是為了解現在和未來。我了解面對當前的問題，我們必須作歷史性的探索，才能真正掌握問題；也接受這樣的說法：若人類沒有未來，我們也不必研究歷史了。我突然自思，面向過去而

生的取徑是可以辯護得通的嗎？

可能由於林毓生先生著眼於當前和未來，他除了嚴厲批評教育改革、批評媒體之外，他苦思這樣的現象的歷史（或思想）根源。他說，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媒體沒有比臺灣更爛的了。他願意拿一個月的薪水來打賭。認識林先生的人都知道，林先生是至為嚴肅的人，他不開輕佻的玩笑，更不存幸災樂禍之心。他說要拿薪水來打賭，我相信，他不以賭贏為樂。會後，我跟他說，一個月的薪水太少了，在臺灣，凡是罰款款額要低，凡是獎賞賭注數目要高，不然無法吸引我，我願意拿我十二個月的薪水，加入他那一邊。同樣的，我寧願我賭輸。記得約兩年前，我在中央研究院西餐廳遇到林先生，他剛回來，很好奇，每天看各種報紙和電視新聞，我告訴他我基本上不看報、不看電視。他似乎有點驚訝。不消兩年，他也受不了了。

林毓生先生認為臺灣媒體之所以這麼爛，只能從媒體菁英的「世界圖景」(world image)來理解。他分析他們的「世界圖景」，歸納出兩個特色。其一是，這個社會和他們沒有干係（就算毀滅了也了無關係）；其二是，混亂。這樣的洞見，大概只有面對現象、不斷苦思的人才能提供的。面向過去而生者，自嘆弗如。

那個清冷的早晨，我多麼希望呂秋鎮能活著。其後，他似乎以一種奇特的形式復活。我時常想到他，時常和他對話——如果他活著的話，他會怎樣看這件事、那件事？比如我成長的國小教師宿舍，二十年前有位老師退休後，搬到臺北，卻佔住宿舍不放，任帶有庭園的日本式屋舍一年一年敗壞。曾有老師很想搬進來，願意補償他加蓋的建物，但他絕不放手。如今屋瓦都塌陷了，再不能住人了；他卻還希冀領搬遷費。那麼好的公家屋舍，就這樣任人拋荒！每次回家，總感到非常難過。如果呂秋鎮還活著，此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同事，他將如何看待這件事？我很想知道。如果他還活著，他將發現他那個世代的人每天被動或主動地花很多時間在看亂七八糟的新聞節目，什麼A>V星或A>B星的，還是頭條新聞呢。（這些A>V星或A>B星在她們秀麗的祖國，除非殺人放火，是上不了新聞節目的。）我很想問二十五歲被刑死的呂秋鎮：這是您想像得到的嗎？您們的格調，您們的品格，怎麼消失得這麼乾淨？您們的姪孫輩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試圖與之對話的呂秋鎮，是精神的存在，不是實體的存在。政治犯有幸回家，他



的家庭在無任欣喜之外，必須面對劫後餘生的後遺症。王伯伯據說返家後，致力於家譜的編寫，似乎努力在尋找安定心靈的東西。去年一月十六日柯旗化先生逝世，柯先生兩度入獄，被關了十七年。他的兒子柯志明教授寄來訃聞，文末附錄的〈我們的父親〉寫道：

在一個承平正常的時代裡，他或許只是一個學生敬重的老師以及著名的文法書作者，這也是他當初期許自己而且全心投入的角色。豈料時代變亂，他以及不少和他一樣平實的人無端捲入無情的歷史巨輪裡，心靈與肉體同遭摧殘。……長久以來，我們家屬，或許正如同其他受難者的家屬一樣，不斷捫心自問，何以這麼一個澹泊而無心於政治的人，在那個時代裡竟至沒有喘息生存的空間？過去教育下養成他剛強正直的人格，難道是如此的不能見容於當道？……〔我們〕心中不忍的是他身不由己的代替眾多同他一樣平凡踏實的人，承受了那個殘酷時代的罪孽。……我們常自付，設身處地同他一樣承受如此的折磨，要如何才得心平氣和？在他而言，有生之年心情或許終難平復，在我們其他人，則幸得有他以身相代，承擔

起煎熬痛苦，方得以獲得一絲喘息反思的機會。……

或許把柯旗化想成世伯呂秋鎮，讀到一半，淚水已糊漫了字。「以身相代」，說得多麼真切！如果呂秋鎮能活著回來，也會和柯旗化先生一樣「有生之年心情或許終難平復」吧？事後，我曾問柯志明教授，他父親出獄適應的情況如何。他笑著答稱，整天批評國民黨。這個泛泛之答相信不夠具體；真實的情況大約只有家屬才能體知。呂秋鎮如果活著，會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

聽了林毓生先生的演講之後，我常陷入沈思。我的面向過去而生，除了「職人」的投入和堅持之外，果真沒有積極的意義？一個全力投入工作的陶匠是不能管外界的風風雨雨的；他有足夠的理由可以這麼做。就我所知，凡是從事技藝或藝術工作的人，身在社會心在另一個世界的，比比皆是。歷史工作者，作為史學技藝的踐行者，不也可以這樣？然而，我退而自思，所謂「面向過去而生」，重要的是個「向」字，其定著點還是當下的時空。這有點像房子的坐向。我們說，這棟房子坐北朝南，其實不管它是朝西或朝東，它座落在同一地點，差別只在於面向何方——但是，這個差別是有意義的，比如面南較面北能多承陽光。換句話說，我再

怎麼聲稱面向過去而生，我非得定著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不可；而我實際上並無法擺脫這個特定的時空。青年呂秋鎮在二十五歲時受刑致死，但我想像中的對話者卻是半世紀後仍活著的呂秋鎮。他不是實體的存在，他是精神的存在。

面向過去而生的「向」字，讓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初不至於陷在「永遠的現在」的爛泥沼中，讓我們和過去取得一絲連繫。（註五）在這裡，我不想重複一些老話，例如歷史能豐富我們的生活、增加我們的思考深度等，我想說的是，面向過去而生，就像向南的家屋，在天寒地凍的冷冬，有陽光可煖。它讓我們聽到那些「以身相代」的青年的聲音：「爲了……，我才活著。」（註六）於是，人們方能自問：我們值得他們的犧牲嗎？我們值得他們劫後餘生的苦楚嗎？如果呂秋鎮在最難撐的時刻，有過這樣一絲朦朧的念頭：「這世界終將有人知道我受的苦，我的犧牲，我的信念。」那麼，我們是否辜負了他？

我們無法不定著在當下的時空，就像屋舍無法不座落在某地，但是，如果我們稍微調整一下站立的方向，時常（但不必時時刻刻）面向過去的話，我們或許比較能反思當下社會，有所堅持、知所拒斥。以此，面向過去而生，看似消極，不能不說還有些積極

的意義。事實上，作為一個史學的藝匠，我並不需要證示范向過去而生的正當性，就像陶匠不需合理化轉轆轤為大千世界的人生。但是，一位哲人也不會說過：過去走在我們

的前頭。果如此，我們能不偶而如引頸眺望前景一樣回首睇視嗎？

終於，我寫下了呂秋鎮的名字。是向過去招魂，還是安魂？但願您能告訴我。

(註一)：我初識黃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該年七月二十六日黃華再度被捕，距上次出獄才一年多，一進去輕易又是個十年。他一生入獄四次，總共被關了二十三年。

(註二)：「逃離惡魔島」是臺灣上映過的一部美國電影，光頭影星泰利沙瓦拉主演。在令人喘不過氣的威權鉗制下，我們經常在一些毫不相關的事物中，看到臺灣的倒影；笑話作為一種精神密碼而暗自流傳著。

(註三)：見James LeMoynes, "Testifying to Torture", *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 June 5, 1988。這篇報導很特別的是，以刑求者和被刑求者的自述交叉報導。刑求者Florencio Caballero在「316大隊」長期工作過，多次刑求股肱羸絲·穆利悠，也觀看別人刑求她。（這位刑求者在訪談中從不用「刑求」這個字眼，而用「interrogation」——偵訊。）兩人的證詞交互證實「316大隊」刑求和處決的事實及其手段的凶殘；同時揭示美國軍方和CIA某種程度的關涉——若非知情，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紐約

時報雜誌》的報導引起相當的注意，促使美國國會舉辦聽證會，並進行一連串調查。根據調查，美國軍方在一九八〇年代，為了消滅拉丁美洲的革命力量，提供右派政府情治人員的訓練，教材包括美國軍方製作的偵訊手冊。雖然某些手冊規誡不可肉體刑求，而傳授所謂的「心理方法」（某些方法實則等同刑求），受訓者在應用時，往往轉為直截了當的刑求。美國軍方的訓練課程和幾套手冊內容，可在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網站，透過其所收載的美國國會相關報告"Report on 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arch 6, 1997)，窺得一斑。

(註四)：關於這段經過，王伯母曾在解嚴後，寫一篇文章，刊登於報紙副刊，見陳延芬，〈我丈夫的匪諜冤案〉，《中國時報》，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第三十五版。

(註五)：「歷史的記憶，已然死去」是普世的現象。艾瑞克·霍布斯邦在《極端的年代》中說：「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

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二十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許許多多身在世紀末今天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繫。因此在這個兩千年紀元將盡之際，歷史學者的地位遂愈發比前重要；因為他們的任務，便是記住已經為其他人所忘懷的歷史經驗。」但願「永遠的現在人」有這樣的自我認識。譯文引自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鄭明萱譯，《二十世紀史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上（臺北：麥田出版，一九九六），頁七。

(註六)：語型取自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最後一行話。在此我並不取該書「爲了……」的具體內容，只取其句型。我認為，內容可以開放，但理想是一致的。該書為第一出版社所發行，二〇〇二年二月初版，同年六月修訂再版。